

剑川石窟与丽江壁画

—少数民族美术资料第一辑—

石老仲教正

陈兆华

一九七八年三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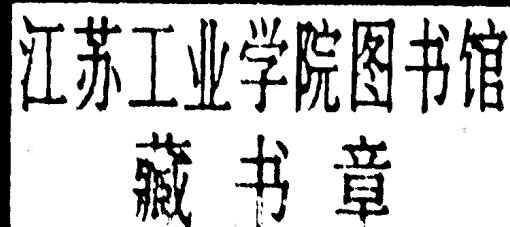
中央民族学院
艺术系美术教研组印编

· 1978 ·

• 少数民族美术资料第一辑 •

剑川石窟与丽江壁画

陈兆复



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美术教研组编印

1978·10·

说 明

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。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长河中，各少数民族积极发展同兄弟民族，特别是汉族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，在共同的斗争中生死相依，患难与共，一起推动着祖国社会历史的前进。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。

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民间美术是绚丽多采的，为了介绍少数民族美术方面的优秀传统，我们整理编印了《少数民族美术资料》，《剑川石窟和丽江壁画》是第一辑。

目 录

剑川石窟艺术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(一) 石窟题记提供的年代..... | 1 |
| (二) 南诏的建立及其它..... | 8 |
| (三) 南诏政治生活的写照..... | 14 |
| (四) 佛教艺术的瑰丽花朵..... | 24 |
| (五) 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..... | 33 |
| (六) 余论..... | 41 |

附录: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剑川石钟山石窟一至十六窟的现状(资料)..... | 43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
关于丽江壁画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(一)十五年后重访丽江壁画..... | 50 |
| (二)十五年前的几篇读画笔记..... | 53 |
| 大宝积宫的读画笔记..... | 53 |
| 大定阁的读画笔记..... | 60 |
| 大觉宫的读画笔记..... | 64 |
| (三)丽江壁画与马肖仙..... | 67 |

附录: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丽江壁画简介(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文化馆)..... | 74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
剑川石窟艺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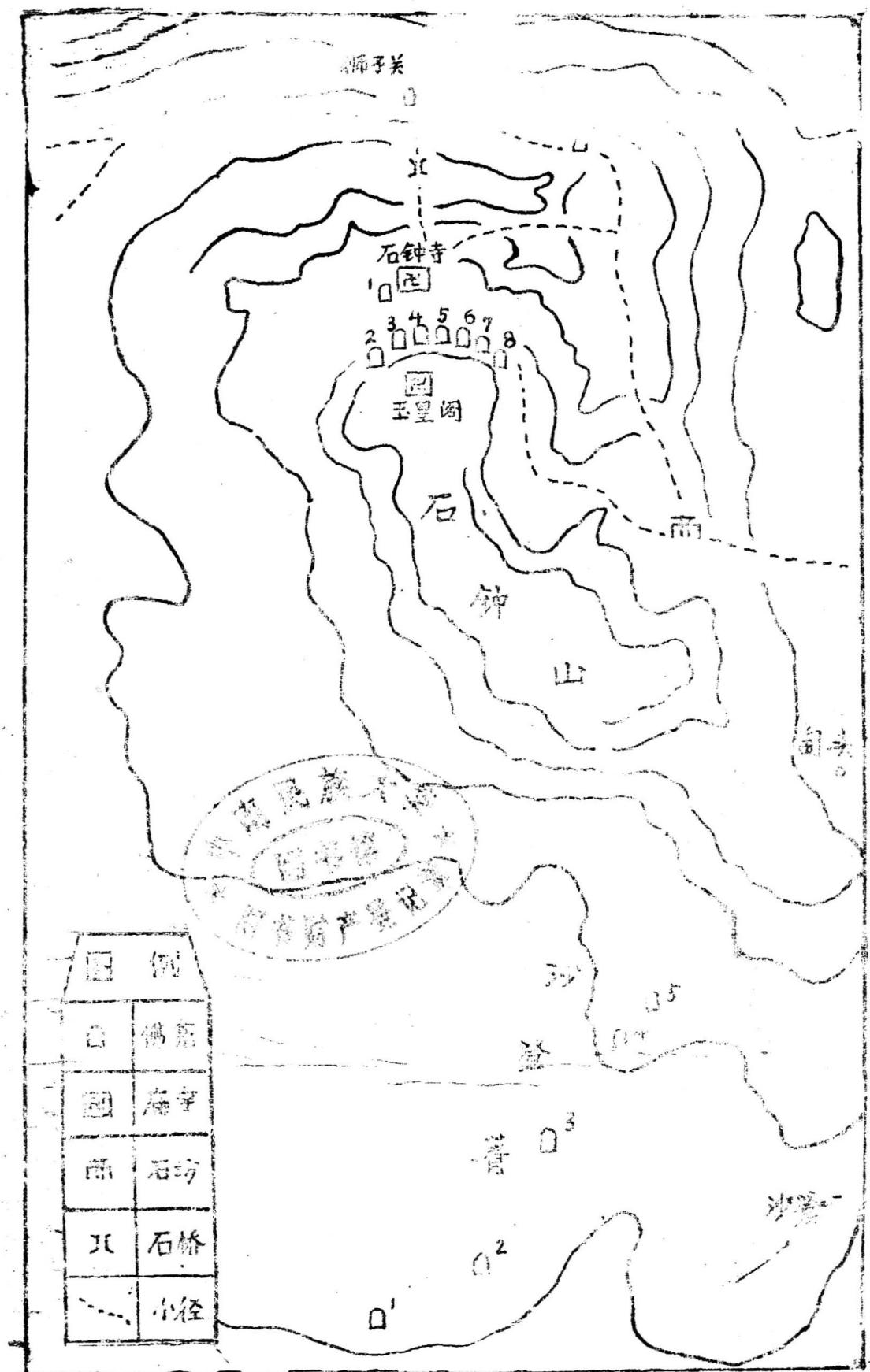
(一) 石窟题记提供的年代

人们往往有这样的想法：中原地区的艺术水平总要比远边省份高一些。汉族要比少数民族高一些。事实却并不总是如此的。敦煌莫高窟的发现曾使我们对西北边塞的艺术刮目相看。最近我去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剑川石窟作了一些调查。这里古代白族雕刻匠师们的精湛技艺，不能不使我再一次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美术赞叹不已。

剑川是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的一个县。离县城西南二十五公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坝子叫做沙溪。在坝子的西北面有两个村子，即甸头和沙登。石钟山就矗立在这两个村子的西北。因山有石如钟而得名。这里风景清幽，奇峰峻峭，丛林掩映。有一个寺庙名叫石钟寺。剑川石窟的主要石刻就雕在这个寺庙附近的悬崖峭壁之上。群山环抱，四周是起伏的松林，石窟近旁有几株参天的古木，脚下是一片竹丛。山间穿插着许多奇形怪状的岩石。每当暮春三月，满山开遍了白色的杜鹃花，景色就更美了。

剑川石钟山石窟，到目前为止已发现了 16 窟，它的分布地点可分为石钟寺、狮子关和沙登村三个区域，则又以石钟寺为主（图 1）。此外，剑川金华山的石雕天王像（俗名石将军），从它的艺术风格上看，也应属于剑川石窟之列。

关于剑川石窟的文献记载是非常寥落的，较早的，有明代大理白族学者李元阳的《石宝山记》，说：“剑川石宝山，缘崖多石像，有观音，有诸菩萨，石岁久，皆若雕镂然。”这里所说的石宝山就是指



雨一鉛川石鐘山石窟分佈圖



圖 2 石鐘寺區石窟遠眺

石钟山，因为石钟山是石宝山的一个支峰，《石宝山记》这块碑现在还保存在石钟寺内。

三十年后，即嘉靖四十一年壬戌（1562），李元阳重游石宝山，又在石钟寺和狮子关等处留下了刻石（注一）。可是三十年前曾与李元阳同游石宝山的杨慎，他《南诏野史》成书于嘉靖二十九年，即游石宝山十八年之后。虽然《南诏野史》中列举了南诏古迹80条，却没有石宝山。在他的《云南山川志》里也没有提到。

康熙年间修撰的《剑川府志》关于石窟的记载也非常简略。卷二里说，“钟山，石宝山南。其中有石龛、石佛、石狮、石虎、牛、马。”很难再找到更多的文献了。剑川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典故不载是可以理解的。那末，我们只好转向石窟本身去探索了。现在我们从石窟的题记中找到了一些线索，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。

石窟题记中，属于南诏国的造像题记有一处，那是沙登村区第一窟，题记竖写刻石，从左到右，共十一行，字体正楷，波磔之处保存隶书笔意。全文如下：

“沙退附尚邑三赕甸彌榜龙，妻盛梦和，男龙庆、龙君、龙兴、龙安、龙千等，有善因缘，敬造弥勒仙、阿弥陀仙。圆王天启十一年七月廿五日题记。”

题记中的“沙退”是沙溪的旧名，现存沙登村后山坡上有一块明景泰元年（1450）立的土官杨惠的墓碑，上面就有“剑川沙退乡”字样，~~石额~~刻本~~甚精~~“附尚邑三赕甸”亦应是地名。“𠙴”“圆”两字均为唐武则天以后流行的“佛”“国”的异体字。这种异体字在云南保留了很长的时间，一直到大理国时期《张胜温画卷》上的题字，以及凤仪县北汤天发现的南诏大理国的古本经卷也有这样的写法（注二）。

“天启”是南诏王丰佑的年号，天启十一年相当于唐武宗会昌元年。

即公元841年。这个题记给我们提供了剑川石窟确切的造像年代。

属大理国时代的题记有两处。一处是在沙登村区第二窟的正窟左侧，墨书二十二字，共分两行，正书直行，左向右读，字迹剥蚀得很厉害，现在大致认得的有：

“大理國沙退口 口 口 禅妇人
观音如 口 像 口 口 口 口 口”

今年六月我去调查时字迹已很模糊，特别是第二行，几乎不可辨认。从各方面看，似属造像题记。但这个题记在露天里，若干年后大概不会存在了。

另一处是在石钟寺区第八窟，窟门外上方雕一长方形空额，额周雕着十分美丽的纹样，额内有墨书题记，字凡九行，也是直书左行，字迹也剥蚀得很厉害，内容的意思已无法弄清楚，隐约可见最后一行为：

“盛德四年作口己亥岁八月三日记”

盛德是大理国段智兴的年号，四年己亥，即公元1179年（南宋淳熙六年），这比《张胜温画卷》还要早一年。字体不恭整，也颇歪斜，显然不是造窟时所书，而是后来写上去的。

从以上这些题记里，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剑川石窟是从南诏到大理国数百年间，逐步开凿而成的。

元代题记约有十余处，都是烧香拜佛，遊山玩水之类的记载，再没有造像的题记了。明清以来，记遊的题刻更多，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。可见，剑川石宝山石窟从南诏以来，一直为善男信女们所膜拜，成为广大群众参观遊览之所。据当地的同志介绍，过去每逢旧历八月初一，附近的白族人民，从鹤庆、洱源、兰坪等地而来这里朝山，年老的烧香拜佛，年轻的赛唱歌曲，要热闹两三天才渐渐散去。不过

知道石窟的人究竟还是不多的。近人徐嘉瑞著《大理古代文化史》记录了大理地区许多文物古迹，可是并未及剑川石窟。这大概因为地点偏僻，已长期无人过问的缘故。

解放以前，石窟不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，而且长期遭到人为的破坏和自然的风雨剥蚀。特别是 1946 年前后，这个石窟寺变成了土匪盘据的巢穴，使这批珍贵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遭到极大的创伤。有的雕像残缺头部，有的毁损手脚。民间至今仍流传着当年土匪破坏雕像的传闻：土匪每次外出抢劫，必先祭奠，如果行劫得手，回来就烧香拜佛；若是失败了，则迁怒于菩萨，砸烂雕像。据说祭奠得最多的是石钟寺第二窟，就是阁罗凤那个窟（详见第三章），现在这个窟的上部已完全被熏黑了，这个窟的雕像也破坏得最为严重。但剑川石窟究因地处偏远，不为外人所知，帝国主义分子的魔爪还没有伸到这里，所以雕像损坏的程度，比起内地的石窟如云岗龙门来就要好得多了。

解放后，中央文物局 1950 年底曾行文通知：“剑川石钟山石窟为边省古代稀有遗产，极堪重视！”要求剑川县人民政府妥为保存，并将各窟内容摄寄中央。1951 年 2 月人民日报社又将登在该报上建议保护石钟山石刻的一份读者投书，剪寄剑川县人民政府，同年六月，中央文物局即派人对石钟山石窟作实地调查（注三）。1952 年中央拨款修建保护石窟的楼阁，在石钟寺区第二至八窟，新建了富丽堂皇的中国古式亭阁建筑，并沿着石崖峭壁处增刻了精美的石质栏干。使石窟面貌焕然一新（图 2）。后来又陆续在狮子关区第一、二两窟，沙登村区第一窟也修盖了亭屋加以保护，并设保管小组驻山管理。1961 年，剑川石钟山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因而得到各方面的重视。

(注一)李元阳在狮子关的刻石内容是：“嘉靖壬戌翰林庶吉士中溪李元阳同游五人过狮子关。”

在石钟寺区第七窟左侧崖壁上的刻石内容是：“嘉靖庚寅，阳辰成都杨修撰慎、余弟元朝来游，今三十年矣。”

剑海西来石宝山，凌风千仞猿猱攀。

巖崿往往构飞阁，崖窟层层可閑闥。

恍疑片云天上落，五丁把住留人间。

霜痕雨溜石色古，璆琳琅玕何足数。

老藤穿石挂虚空，欲墮不墮寒人股。

嘉靖壬戌春日翰林庶吉士中溪山人李元阳。”

(注二)宋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：“大理国有文书至南边，入商人持其国佛经。题识犹有用圜字者。圜，武后所作国字也。”

(注三)最早去剑川石窟调查的是宋伯胤同志他曾将调查结果写成《记剑川石窟》一文刊载在1957年4月《文物参考资料》杂志上。195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单行本《剑川石窟》。

(二) 南诏的建立及其它

如上所述，从现存的资料看，剑川石窟开凿于南诏时代。

南诏的建立，曾经对于推动云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，起过积极的作用。那是在唐初的时候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大理地区包括白族先民在内的各部落之间，出现了势力较大的“六诏”等部。“诏”是大首领、大酋长，也就是王的意思。其中蒙舍诏（今大理州巍山县），地在南方，因称南诏。当时唐朝正与吐蕃（我国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地方政权）在云南的西北部发生频繁的冲突，其余五诏受吐蕃威胁，常弃唐归附吐蕃，只有南诏那时一直附唐。公元713年，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，后来又赐名蒙归义，进爵为云南王。738年，皮逻阁谋兼併五诏，因当时唐朝与吐蕃正在四川西部进行着一次战事，南诏攻五诏，有牵制吐蕃的作用，所以得到唐朝的帮助，使它在兼併其它五诏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。

这时，剑川是在六诏之外的剑川诏，也为南诏所攻灭，诏主亦投奔吐蕃去了（注一）。《南诏德化碑》中说：“又与中使王承训同被剑川”，即指此事。这个王承训就是唐朝派往南诏参与军事的宦官，可见剑川之陷，唐朝是直接参与其事的。

后来，五诏之一的浪穹诏被南诏击败后，徙居剑川，称为“剑浪诏”。《蛮书》上说：“（浪穹诏）与南诏战，败，以部落退保剑川，故称剑浪。”所以剑浪与浪穹其实是一诏。这是开元年间的事，到贞元十年（794）南诏再征剑川，灭浪穹诏，六诏才得到最后的统一，那是在几十年以后了。（图3）

五诏之中，浪穹被灭亡得最晚，这和它退保剑川这个战略要地很有关系。杨慎在《剑川志序》中称“剑川为要害地，唐为节度雄镇”

(注二)。剑川是最后归入南诏版图的，它地近铁桥城，是吐蕃入南诏的军事重镇。在南诏时期，南诏与吐蕃时战时和，当南诏归附吐蕃时，剑川成为吐蕃秣马励兵，虎视邻邦的要塞，在战时，剑川又首当其冲，成为军事上必争之地。从文化交流上说，剑川又是南诏与中原汉族、吐蕃藏族等兄弟民族，以至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，特别是雕刻艺术的汇集点。这些历史和地理上的特点，都在剑川石窟中得到了反映。

南诏从统一六诏，到为大理国所代替止，前后二百余年，它的最盛期的疆域，据《新唐书·南诏传》说：“东距爨（昆明、曲靖一带），东南属交趾（今越南境），西摩伽陀（今印度境），西北与吐蕃接（今中甸、维西一带当时属吐蕃境），南女王（今老挝境），西南骠（今缅甸境），北抵益州（今四川，至大渡河南岸），东北际黔巫（今贵州西北至四川奉节一带）。”南诏统治区域之广，实为云南历史上所仅见。在此如此广大的疆域内，国内各部族、部落不同，各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唐、吐蕃对于部族、部落的影响不同，所以南诏国内各部族、部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发展，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各种不平衡状态。

南诏的建立，逐渐把大理地区不同的部族、部落融合为一个共同体，或者说民族集团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白族。它的发展开始于南诏时代，并在大理国时代更形统一与巩固（注三）。南诏后期，国内常起变乱，国号屡改，公元937年段氏大理建立，形势才较稳定下来。段氏大理是在南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由段思平执政起至元世祖忽必烈草囊渡江（金沙江）灭大理国止，共历三百余年，大理国统治者接受宋朝的封号，与宋朝保持一定的从属关系和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。当时大理向内地输出的有战马、手工艺品和药材等，从

内地输入的有汉文书籍、锦缎和工艺品等。在南诏、段氏大理统治的五、六百年间，白族人民和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友好合作，团结互助，共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，使大理地区成为当时云南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。

任何一个发展着的民族，必然要吸收可能吸收到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来丰富自己，愈能吸收别人的长处，愈对自己有益。南诏文化显示着向汉文化看齐的趋势，也就是逐渐革除旧有的风俗习惯，接受较高级的汉文化。南诏第八代王异牟寻与唐朝恢复和好关系之后，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允许南诏派遣贵族子弟轮流到成都就学，前后相沿五十年，学成回去的人数很可观（注四）。南诏统治阶层中有不少是精通汉学的，如清平官（宰相）杨奇鲲，段宗义都做得一手好诗（注五）。段氏大理时期与内地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仍然很密切。宋乾道九年（1173）李观音得等带着文书到内地采买大批汉文图籍，文书后附有短章：“言音未会意相和，远隔江山万里多”（注六）。从这些情况看来，南诏大理文化基本上是汉文化，到段氏王朝时已无甚区别。在历史上，汉族人民曾经不断地迁入本地区，并大量融合于白族之中，对白族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。所以在一千年以前，白族人民开始应用汉文和白语汉字，把本民族的历史、科学和文化成就记录下来。在七百年前已有了刻板印刷，从北汤天发现的古本经卷中的木刻佛画看，元明时期白族人民的雕板艺术较诸同时期的浙刻、闽刻是并不逊色的。再说南诏建筑的崇圣寺三塔，主塔高五十八尺，千余年来虽然屡经地震和风雨的剥蚀，依然巍峨鼎立于苍山洱海之间。元明时期建筑的鸡足山佛寺建筑群，结构雄伟，充分显示了白族人民的智慧和才能。其它如南诏德化碑、蛇骨塔、圣沅寺、德沅城、巍宝山、铁柱庙、等，大理境内的名胜古迹，可说是琳琅荟萃。在古代白族人民创造的众多

多的文化遗产中，剑川石窟以它特殊的历史价值和高度的艺术水平而占有突出的位置。

(注一)《蛮书》卷三。

(注二)《升菴全集》三卷

(注三)参看《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》(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)杨堃、方国瑜二先生文章。详见该书第1—17页。

(注四)《通鑑》“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，迨以千数。军府颇厌于廩给。杜悰为西川节度使，奏请节减其数，诏从之。南诏丰佑怒，索习学子弟，移牒不逊，自是入贡不时，颇扰边境。”

(注五)《北梦琐言》卷十一载杨奇鲲《途中》诗：“风里浪花吹又白，雨中岚色洗还青，江鸥聚处窗前见，林狖嚦时枕上听。此际自然无限趣，王程不敢暂停留。”

(注六)见《文献通考》卷三百二十九《四裔六》引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佚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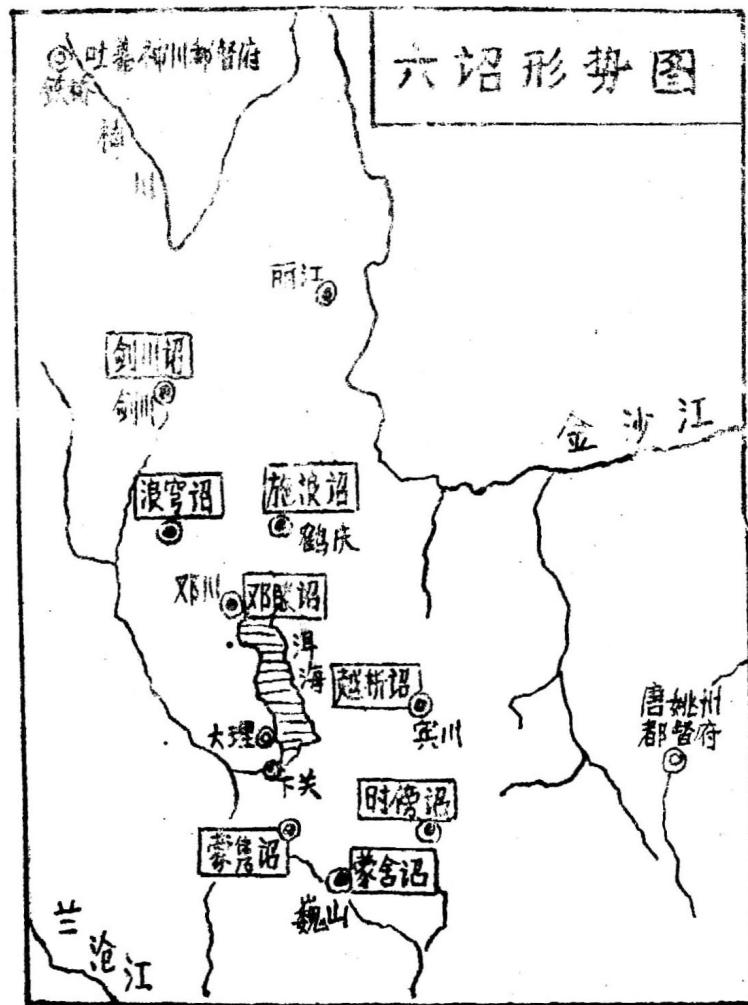


圖3 六詔形勢圖



卷之三十一